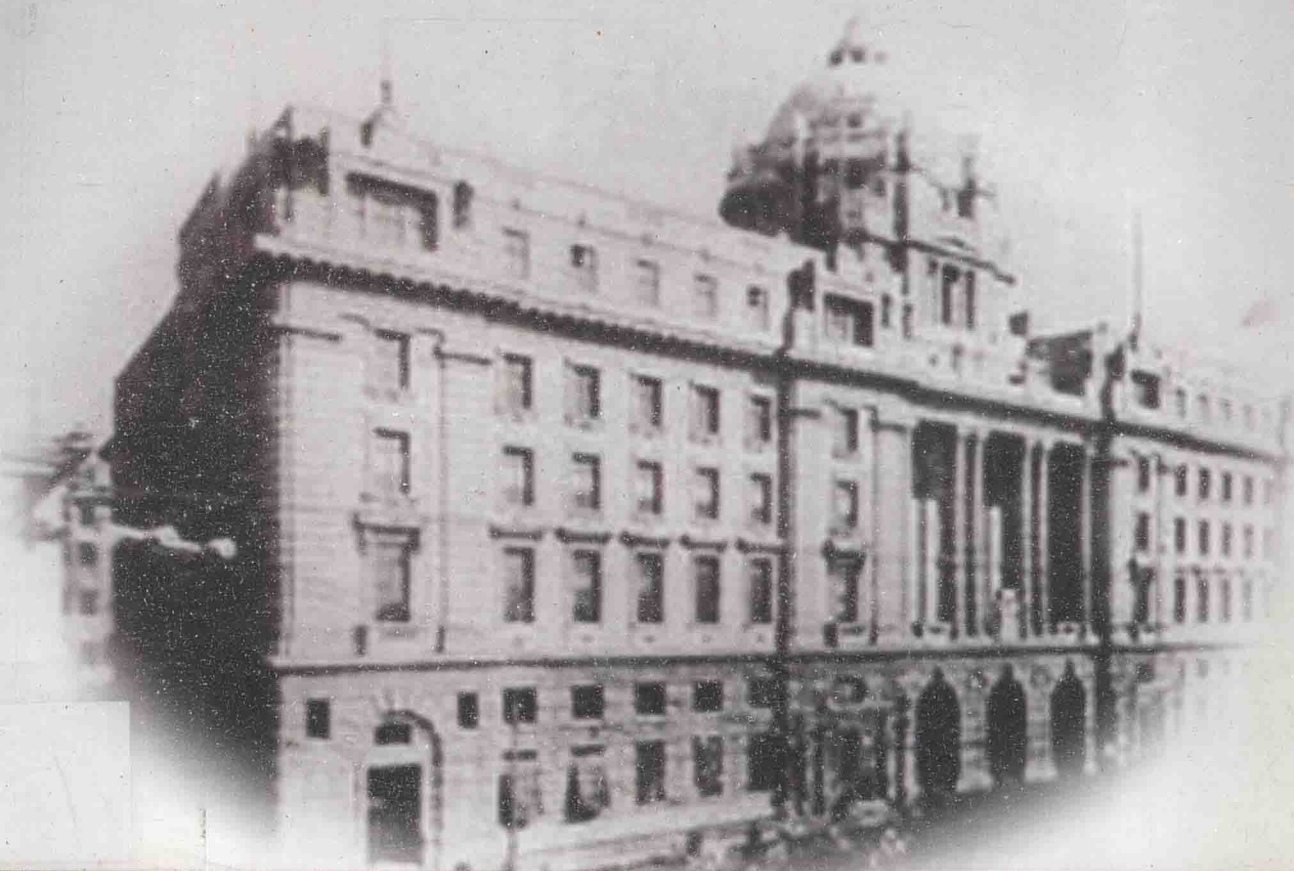


中国
的

1937—1945
战时财政和通货膨胀

[美] 阿瑟·N·杨格 著
陈冠庸 译校



中国的战时财政和通货膨胀

1937—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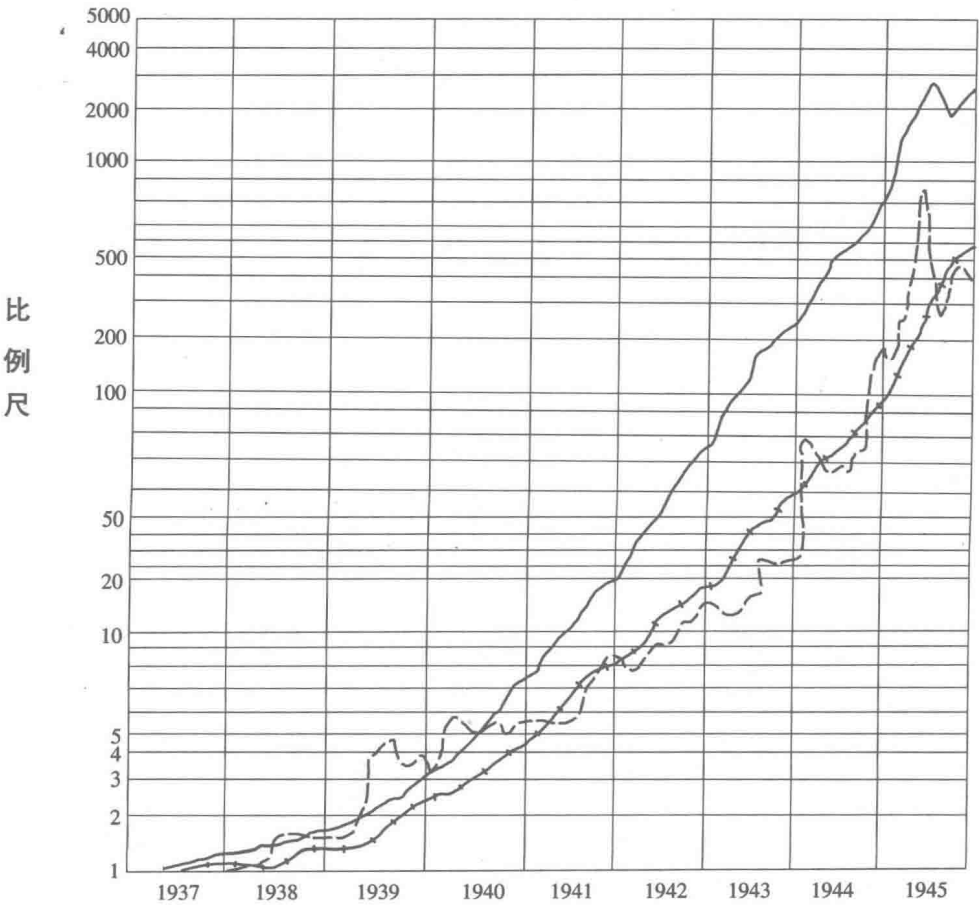
〔美〕阿瑟·N·杨格 著

陈冠庸译校

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世界经济研究室

1937—1945年中国的物价、汇率和钞票发行图



- “自由中国”的平均零售市场物价。
- 法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其中1937—1941年是上海的汇率，1942—1945年是“自由中国”的汇率。
- +—— 国民政府的钞票流通额。

所有指数均以战争刚开始前的数字等于“一”为基数进行计算。

译校者的话

本书(*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是美国阿瑟·N·杨格(Arthur N. Young)关于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财政和通货膨胀的一部专著,被列为美国哈佛东亚丛书第20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5年出版。著者自1929年起,应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之聘,担任财政顾问之职,先后被派到财政部、行政院和中央银行工作,直到1947年终才因病辞职返美。著者在来华任职之前,在美国曾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担任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顾问;1918年至1920年,先后担任过墨西哥政府和美国政府的贸易和财政顾问;1920年和1921年任洪都拉斯政府顾问;1922年至1928年任美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在离华返美后,又于1951年至1952年间任美国派赴沙特阿拉伯财政代表团团长,并担任美援规划的代理主任。此后仍以财政事务顾问的身份活跃于拉美和东南亚地区。著者的论著颇多,其中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的《1937—1945年的中国与外援》一书,是本书的姊妹篇。

本书全面叙述和分析了中国在1937—1945年的财政金融事务,论及岁入、岁出、财政政策、债务与外援、通货发行、货币管理及通货膨胀等等,还提供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实行货币改革的背景材料和战后“复兴”计划的梗概。由于著者担任中国高级财政顾问达19年之久,对国民党政府在这个时期的财政金融管理的整个过程亲与其事,手头掌握着大批原始纪录;而且他在美国又享有查阅国务院有关纪录和《摩根索日记》等的权利,故全书旁征博引,其事实材料之丰富,在同类著作中,堪称鲜见,为中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问题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同时,著者作为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财政金融专家,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工作方面的许多问题,也确实表述了不少独到的见地。特别是著者在控制货币发行量及通货膨胀、发行国内债券及争取外援、合理动用外援及外汇平准基金以及维持适合的外汇汇率等方面的见解,颇具参考借鉴价值。在本书中,人们还可以从著者提供的内幕材料中窥见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勾心斗角和腐败无能的情景,也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决策官员之间以及美、英政府之间的种种矛盾。但是由于著者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又受到种种政治偏见的影响,故在涉及中国主权和民族感情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等政治方面的问题时,其见解多有片面及谬误之处。特别是著者把国民党反动统治于1949年最终垮台的原因,主要归结为财政金融管理不善和通货膨胀,则显然是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历史进程缺乏必要的认识。

鉴于译校者译校水平有限,加上手头参考典籍不足,难免存在错漏。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并多予见谅!

陈冠庸
1982年5月

作者原序

本书论述中国在1937—1945年战争年间岁入和岁出、国内借款、外国财政援助以及通货管理和通货膨胀问题。

1963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937—1945年的中国与外援》一书，专注于该时期中国为本国做了些什么和其他各国为中国做了些什么；它还论述了中国和其他各国没有做到的又是些什么。因此那本书必然载入了许多关于财政金融方面的资料。然而本书则是专注于财政金融的记录。为了完备起见，在这里对前一本著作某些论述过的题材，作一定份量的重复是在所难免的。论述黄金的第十九章，内容与我于1956年在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时提交的一份声明相似，同《中国与外援》的第十七章几乎一样。然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对两书均有论及的题目，则在关系较大的一本中作较为深入的论述。显然在这里不宜于评论国内、国际和军事等方面的事态，这些事态是中国管理其战时财政金融事务的背景。对于这一类事态的记录，请读者参阅我的另一本著作。

本书主要参考了我担任“财政顾问”时所汇集的当时资料。中国政府同意我使用这种资料。其中某些部分，由于战时和战后许多官方记录的散失，确实比其他地方现存资料要完整得多。书内引用的统计数字和所作记述，除另作说明的以外，绝大多数来自我在中国服务期间所汇集的文件。现在回顾起来，我本该汇集更多当时的数据资料，这样就不致于在目前的事实记录上出现偶然的缺漏。但是当时正在战时，而我的主要职责是做份内的事而不是做研究工作，在提供财政方面的数据资料时，我还利用了中国财政部1948年刊印的《财政年鉴》。在使用有关政府活动的统计数字时，有时也发生一些问题。1937年中国的财政和统计机构日见改进，可是许多人员缺少训练和经验。战事发生后，敌军蹂躏中国大部分地区，后方大肆轰炸，使政府机构陷于瓦解，遂致详细和精确的记录难以保存下来。中国的统计和会计人员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忠于职守，努力工作。可是他们无法克服由于战时混乱以及某些原始数据不足而带来的困难。据我看来，本书所呈现的材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我在书内一一罗列出了它们的出处。由于本书中的一些统计资料经过重新整理，以致某些数字与《1937—1945年的中国与外援》一书上引用的有所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①。

我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记录中，还看到了《摩根索日记》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1956年我列席该委员会作证，可以不受限制地看那些日记。那份资料看来是概括了1940—1945年间美国财政部与中国打交道的最为重要的部分。我不可能看到这些日记中关于战时的其余部分内容，原因是在1965年之前这部分内容除

^① 本书所有各表的数据，由于四舍五入的缘故，加起来不一定等于总数。

对摩根索先生或他的代理人之外是保密的^①。与此同时，在此书打印出来以后，该小组委员会发表了该《日记》同中国最有关系的那部分详细摘录，特别是同财政部的哈里·D·怀特的活动有关的部分^②。这些摘录内有摩根索参加的会议的逐字逐句记录，并附有许多份文件。该摘录里还有我在小组委员会的档案中所见过的许多资料，而且比它还要多。这些附加材料扩大了内容，但实质上并没有增加或更改我在本书中所述的内容。而这时我这本书已经打印，安插这些摘录的参考资料便办不到了。鉴于这些材料登在摩根索先生的编号从189至863号的一系列“书”中（虽然不是一整套），读者如欲查阅，可在这套书刊中看到我的参考资料及某些附加资料的绝大部分，而不致有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除利用《摩根索日记》的资料外，我还有机会看到了涉及整个战争时期的未发表的美国国务院记录。我还利用了已经发表的官方和私人的有关资料，并曾与中国、美国以及日本的许多当事人谈过话。

集中研究战时和战后中国通货膨胀的两本著作已在最近出版。这就是张嘉璈的《1939—1950年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中国的经历》（纽约1958年版）和周舜莘的《1937—1950年中国的通货膨胀》（1963年纽约版），后一本书基本上是在我的稿子已准备付印以后才问世的。张博士除在战时当过交通部长外，战前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多年，又于1947—1948年任中国中央银行总裁。周博士则是战后时期中央银行的职员。对于战时通货膨胀的性质和原因，两位作者的一般结论实质上跟我的见解是一致的。

我力图在任何可避免的、重要的资料方面不重复这些学术论著。首先，本书仅论及战时情况。还有，本书部分地依靠一般弄不到手的数据资料，比较详尽地提供了主要的财政和货币统计数字，并在这些数据跟别的文献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时，对这种差异作了分析。再则，本书从一个日常参与其事的局内人的角度，论述了当时产生的各项问题、负责官员所感受到的压力、各种可供考量的抉择、对决策有所影响的诸因素，以及贯彻财政货币政策的全过程。好就好在事件发生之际即有所感觉，但与此同时就有个是否客观的问题。至于我在措词和判断上是否做到公允，那就有待读者来评定了。

下述各出版物承蒙允许引用，谨此致谢：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出版社及约翰威利父子公司共同出版、版权属于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张嘉璈所著上述一书；香港联邦研究所出版的郑卓元著《共产党中国的金融》；乔治·E·泰勒著：《华北之争》。

又承各方面人士有批评地帮我校阅了部分原稿，并此表示感谢：前金陵大学的卜凯；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J·B·康得利夫和李卓敏；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农业专员欧文·L·道森；前远东事务司司长及国务卿政治顾问斯坦利·K·霍恩贝克；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L·K·李度；前财政顾问及中国盐务署会办奥利佛尔·C·洛克哈特；以及原在中国银行、现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并承蒙下列各位人士给我多方帮助，并此表示谢忱：前铁道部长及交通部长张嘉璈；进出口银行的R·W·佛伦奇；研究中

① 在罗斯福总统任期结束二十五年之后，这些日记准备让一些具备条件的学者阅读。见J·M·勃鲁姆，《摘自摩根索日记：危机的年代，1928—1938年》（波士顿1959年版）第10页。

② 美国第8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调查国内安全法案及其他国内安全规则实施情况小组委员会：《摩根索日记（中国部分）》，共两卷，1699页，1965年2月5日出版。卷首有A·库贝克所撰前言。

国金融问题的老权威耿爱德；前中国财政部次长顾翊群；西方学院的 P·K·莫；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馆图书管理员 P·K·莫夫人。国务院历史科科长 G·贝尔纳德·诺布尔和该科的 E·泰勒·派克斯帮助过我使用美国政府的档案资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调查国内安全法案实施情况小组委员会的人员，帮助过我查阅部分《摩根索日记》。我妹妹撒拉·阿黛尔精心地整理过稿子。我的妻子内莉自始至终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和鼓励。我特别感谢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感谢他多方面的良箴。我感谢以他为主任的该校东亚研究中心给予本书的赞助，感谢它为此书的准备和出版负担了一些费用，以及为本书的定稿付印所给予的帮助。我还感谢约翰·西蒙·格根海姆纪念基金通过提供奖学金和拨款对本项工作的帮助。最后，我对哈佛大学出版社全体职员，以及他们中未署名的审稿人，就一部繁复的著作的问世，以及本书与其姊妹篇《1937—1945 年的中国与外援》内容材料如何划分所提供的意见，表示衷心感谢。

对于本书的最终模样，以及其中的任何舛误或疏漏之处，当然由我负责，而与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无涉。

阿瑟·N·杨格

1965 年于加利福尼亚州巴萨地那镇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战前情况	(1)
----------------	-----

第一篇 收入、支出和财政政策

第二章 现金收入和支出	(6)
预算上的现金财务：收入与支出	(6)
预算上的现金岁出	(8)
追加预算上的现金收入与向公众举债	(10)
追加预算上的现金支出	(11)
预算中与追加预算中的现金收入与支出概要	(15)
第三章 米—麦预算；按现金和按实物计算的总收入和总支出	(16)
农业经济与税收	(16)
征实	(17)
实物收益	(19)
实物收入的价值	(20)
按现金和按实物计算的总收入和总支出值	(21)
第四章 财政政策	(24)
岁入	(24)
岁出，赤字	(39)
评价	(46)

第二篇 债务和外援

第五章 1937 年年中的债务情况	(49)
债务总额和近期偿付概况	(49)
外币债务接受机构	(50)
国内债务接受机构	(51)
到期未偿债务	(52)
第六章 国内借款	(53)
向公众借债和银行法币透支	(53)
1938—1940 年国内外币债券的发行	(56)
1942 年以美元支持发行的公债	(57)
向国内公众借债的总结	(63)

第七章	战前外债	(64)
	私人外债	(64)
	1901 年的庚子赔款	(67)
	其他的政府间债务	(69)
第八章	1937—1941 年的外国购货贷款	(70)
	俄国贷款	(70)
	美国贷款	(74)
	英国贷款	(77)
	法国贷款	(78)
	德国易货协定	(78)
第九章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外国贷款和租借物资	(80)
	美国的五亿美元贷款	(80)
	英国的五千万英镑贷款	(82)
	美国的租借物资	(83)
	英国的租借物资	(85)
	用以制止通货膨胀的租借物资	(85)
第十章	总结和评价, 债务和外贸; 战后计划	(87)
	1937—1941 年的外国贷款和租借物资	(87)
	1942—1945 年的外国贷款和租借物资	(88)
	国内借款	(90)
	战争结束时的债务情况	(90)
	计划中的战后债务处理	(91)
	计划中的战后借款	(93)

第三篇 通货、货币管理及通货膨胀

第十一章	1937 年年中的通货膨胀	(95)
	通货	(95)
	银行业	(97)
	物价	(98)
第十二章	物价、汇兑、利率	(101)
	物价的测定	(101)
	“自由中国”的物价变动过程	(103)
	物价管制	(105)
	沦陷区的物价变动过程	(111)
	外汇政策与汇率	(112)
	国内汇兑	(114)
	利率	(115)
第十三章	信贷、钞票发行、存款	(116)
	信贷膨胀	(116)

	钞票发行	(117)
	存款	(119)
第十四章	伪币、日币和共产党货币	(122)
	华北伪币	(122)
	华北白银	(129)
	华中和华南伪币	(130)
	日本军用券	(135)
	共产党货币	(138)
第十五章	战争第一年的货币管理	(140)
	白银	(140)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3 月的坚持局面	(143)
	外汇配给制度	(147)
	并不那么紧的银根	(151)
第十六章	1938 年 6 月至 1941 年 8 月的外汇平准活动	(153)
	1938 年 6 月开始通过市场买卖来稳定外汇	(154)
	1939 年 4 月至 8 月的英—中外汇平准活动	(156)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汇价变动	(166)
	为得到更多资金来支持通货而行动	(168)
	对于外汇管制的取舍	(173)
	一场争论：赞成与反对的意见	(174)
	应该如何利用新的货币贷款	(178)
	1940 年 6 月至 1941 年 7 月间发生的问题及其反响	(181)
第十七章	冻结和外汇管制，1941 年 7 月至 12 月	(184)
	实行冻结，1941 年 7 月 26 日	(184)
	中国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接管	(186)
	外汇和外贸管制，1941 年 8 月至 12 月	(187)
	中国的反应，物价，黑市，1941 年 4 月至 12 月	(190)
	平准活动与外汇管制所付代价的比较	(193)
	评价	(194)
第十八章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货币管理：通货膨胀、美国军事费用及汇率	(196)
	通货膨胀与货币崩溃危机	(197)
	通货膨胀与过高估值的汇率	(198)
	关金单位的结束	(201)
	美国军事费用的筹措	(202)
	反方向的租借援助	(206)
	货币压榨：非军事性的财务收支	(207)
	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结束	(208)
	问题及其后果	(210)

第十九章 黄金的抛售和停售	(211)
黄金抛售方案的由来	(211)
美国财政部同意供应黄金	(211)
中国开始出售黄金	(213)
美国财政部停运黄金	(215)
一场争论：赞成与反对的意见	(217)
问题的解决	(220)
装运的恢复	(223)
小结	(223)
第二十章 经济分析	(226)
通货膨胀的原因	(226)
纸币发行量、货币流通速度及物价	(229)
物价与外汇的相互作用：市价和官价汇率	(231)
与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比较	(234)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235)
战后的货币改革问题；自力更生与外援	(236)
第二十一章 通货膨胀的后果	(240)
政府财政与稳定物价	(240)
收入和财产的分配	(241)
军队	(242)
拿薪水的人员	(243)
通货膨胀与贪污腐化	(244)
通货膨胀与知识分子	(245)
通货膨胀与人民大众	(246)
商业、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	(247)
后果	(248)

附 录

A. 收入、支出、债务、外援	(250)
B. 物价	(267)
C. 汇率	(277)
D. 钞票发行	(281)
E. 白银和黄金的买卖交易	(284)
F. 其它	(288)
G. 1943 年关于国际货币计划的备忘录	(291)
H. 1945 年关于中国远景财政问题的备忘录	(293)
编后记	(298)

第一章 战前情况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前途的各种财政金融事态发展的序幕。接着发生的混乱局面和通货膨胀又无情地持续了很长时间，使国家难以从八年多的苦战中恢复过来。

共产党政权在1949年接管大陆中国后，人们只注意到已经改观的局面，而忽略了对国民政府从1928年接管到1937年年中日本进攻这段时期内所作改革的认识。在1928年，国内形势极为混乱。当时没有真正的中央政府，内战频繁，盗贼四起。铁路遭到破坏；公路和空运几乎不存在。货币是银币和银两、币值经常波动的铜元和纸币的大杂烩，而且各地不一样。除了外国人管理的关税和盐税外，中世纪式的理财办法起着支配作用。债务多半拖欠不还。过去历届共和政府都陷于这种恶性循环之中。由于缺乏款项，它们没有力量，也无法进行改革。而且由于缺乏权威，它们不可能建立起必要的税收制度。

1929—1934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平定了称王称霸的各路大军阀，并把共产党人从长江流域的根据地驱赶到遥远的西北，在那里，共产党人仍然是一种遥远的或者是正在日渐削弱的威胁。到1937年，中国国内是安定的。政府的力量逐渐增强，蒋的威望提高。但是，操纵政治的将军们仍然拥着重兵。中国的地域观念很强，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中央的影响要靠金钱津贴、政治捧场、连哄带骗和求情徇私等手段来维持。

1931—1932年，日本强占了通常称作“满洲”的东北三省，成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这就开始了实际历时十四年的最初是打打停停的抗日战争；1937年年中以后便发展为全面战争。满洲的沦陷，使中国丧失了富饶的土地，那里原是提供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等重要出口商品的产地；同时也使中国断绝了丰富的矿产和水电资源，失去了一个主要的重工业基地。但日本居心叵测，又继而猖狂侵犯华北。其目标之一就是在北平以北的冀东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该地区早已成为走私、贩毒者的天堂和偷运白银出口的通道。这些侵略固然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国内问题，但同时也加强了民族主义意识，使人民日益把国民政府看作权力中心。鉴于存在外来侵略的威胁，人民愈来愈感到应该结束内战了。

一百多年来的中外冲突，给中国及其毗邻地区留下的遗产是各种外国特权。俄国和日本长期争夺满洲的结果是日本占了上风，并随着1931年强占该地区而巩固了地位。香港及毗邻的九龙租借地属于英国。葡萄牙占着香港南面的澳门。有几个港口存在着国际共管或外国政府统治的局面，其中对财政金融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天津的法租界和英租界。一方面，中国在这些地区没有管辖权，这就意味着日本人在掠夺邻近的中国领土时，对这些地区不得不有所尊重。因此就使中央银行得以留在上海滩上，在政府的其他几家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协助

下,继续行使其支持货币的职能。在华北,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仍留在天津法租界内,维持着那个重要地区的货币。此外,香港对中国则起着重要的经济、金融基地的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1年12月7/8日^①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为止。

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施行的法律和规章并不是由中国的统治机构制定的,所以中国对这些地区发生的事情就无权过问。这些地区给逃避中国政府各项措施造成了不少漏洞。不难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对这些受外国统治的地区的存在,早已感到不满。但总的来说,它们的存在,在太平洋战争以前的战事中,却肯定是对中国有利的。

外国人早已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他们凭着这种法权,可以不受中国法庭的审判而只受他们本国法庭的审判。这种安排原本是中国愿意的,因为“夷人”有其独特的法律和习惯。但是这些古老的协定终于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而且在战争后期普遍地被废止了。

国民政府在1928年开始掌权时,实行了一套重大的财政改革方案,要是没有这些改革,它就不可能存在那么久。主持这些改革的两任财政部长,是1928—1933年间的宋子文和1933—1937年间的孔祥熙。国民政府有了可靠的收入。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收复使关税收入大为增加。一项经过改革的对食盐、烟草、棉纱及其他货物征税的国内税收制度,也使收益日渐增多。在1937年6月30日截止的战前最后一个财政年度中,非借贷的总收入为法币八亿七千万元,相当于1928—1929年度的两倍半以上(在这同时,物价均上涨了10%)。厘金这种旧式的国内货物通行税已逐渐废除。但是在一个农业占五分之四的国家里,未能改革土地税,这就阻碍了这个本来可以成为主要岁入来源的部门的发展。

支出方面的情况也不是那么好。为镇压野心勃勃的军阀和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繁频内战,是政府为维持其生存而非进行不可的。自从1931年秋季日本入侵满洲后,政府又必须装备军队进行防御。因此军事当局在政府里有最大的发言权,能够优先获得所需款项,许多军事开支几乎不受限制。

主要由于浩繁的军事开支,致使财政赤字扶摇直上。但这时政府还能够做到避免滥发钞票。它用未来的税收作担保,不管条件如何苛刻,在上海大举借款以弥补赤字。没有这些借款,政府就无法维持其政权,就不可能推动全国的统一和抵抗日本的压力。偿还旧债的款项,部分地抵销了赤字。在战前的那些年份,这些债务的支付共占赤字的半数以上。

1937年年中,在预算为法币十亿元(约合三亿美元)左右的基础上实现财政稳定是力所能及的。当时有指望的每年赋税收入是:关税大约为法币四亿二千五百万元,盐税二亿五千万元,统税一亿五千万元,杂税一亿二千五百万元——总计约法币九亿五千万元。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内秩序的改善,岁入的继续增长大有希望。预算和会计制度也在改进,政府第一次公布了相当全面和准确的财政报告。行政管理有了进步。但是,由来已久的官方“勒索”,裙带风和冗员等现象始终存在,屡见不鲜。中央的权力

^① 太平洋战争开始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按中国时间,该事件发生于1941年12月7日晨,而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则是1941年12月8日。另外,东西半球的国际时差也是一个因素,作者用1941年12月7/8日来表达太平洋战争发生时间(下同),可能原因在此。

尽管日益受到尊重，但地方主义对政府来说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并成为增强国力的一个主要因素。1933—1935年，美国不顾中国一再抗议，一意孤行地推行白银收购政策，使中国的白银储备大量外流。它把中国银元的价格提高到超过币值的水平，给中国带来了银根紧缩、信贷收缩和市场萧条的严重后果，它迫使中国放弃了历史上一直采用的银本位制。于是中国采用了一种管理的货币制度，既不同美元也不同英镑（当时在波动中）发生联系。这种新制度下的通货通常称之为“法币”，意思是无限法偿的货币，其单位通常称为元。

当中国中央银行把法币的汇率维持在1元约折合0.30美元或14.5便士上时，中国货币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个稳定的汇价。还存在着一个兑换或买卖货币都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实行改革之后，由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开始向中国的中央银行购买白银，从而把白银转换为现成可用的美元和黄金，这就使美国的这项白银政策最终变得对中国有利。到了1937年年中，美国总共购买了价值六千六百万美元的白银。中央银行有了这笔国外储备作支援，就使投机分子在做中国货币投机买卖时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新建的上海造币厂每天二十四小时开工铸造镍币和铜元等辅币，因为市面亟需大量这些辅币来代替那些成色不纯的旧银币和铜元以及币值不定的旧纸币。

使汇价稳定在一个经济水平上，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由于恢复了对货币的信任，在过去混乱年头里大量外逃的资本现在又回到了中国，出口也增加了。依照1937年6月30日的计算，黄金、白银和外汇的总储备达三亿七千九百万美元。这些储备约占中国货币发行总额的67%。货币发行总额估计为法币十八亿九千七百万元，大约相当于五亿六千五百万美元。不过储备中包括有约值一亿六千八百万美元的白银，这些白银尚未出售，倘若要把它迅速变卖为现金，就势必冲击市场。此外，大部分白银存放在易受敌人攻击的上海。

1928年成立的中国中央银行，最初主要是政府的一个财务机构。但是它逐渐担负起越来越多的调节货币的职能，在国内外的声望也日高一日。1937年年中，它拥有占储备大部分、价值二亿一千一百万美元的黄金和外汇。1937年7月初，政府曾批准一项计划，准备把这家银行改为中央储备银行，但由于日本的进攻而没有实行。

由于币制改革提高了对货币的信任，加上国际收支有顺差，遂为清理旧北京政权积欠的大部分债务扫清了道路。1928年，政府恢复了对有些旧债的还本付息。到1937年年中，它已经清理了价值两亿五千万美元的积欠债务。当时在国外出售的主要外币债券的利率约有5%，而且价格高于同类的日本债券。1937年年中在上海成交的国内债券，利息为8%，而三十年代初期的债券，则为12%—15%。

中国在这个时期的财政改革，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堪称自力更生的范例。当时唯一的外国政府信贷来自美国，总额约两千六百万美元（已动用），即1931年约九百万美元的水灾救济借款和1933年约一千七百万美元的棉麦借款。^①

^① 此外，在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5月4日，进出口银行还认可了为数一百六十万美元的一笔贷款，作为购买机车之用，但该项协议却一直到了1937年12月21日才签署。该款只动用了七十三万三千二百美元，并已于1942年偿还。

.....

4

据我所知，对于 1928—1937 年中国经济取得的进展，迄无切实的分析，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以及诸如西北和海南岛等地的开发计划。这些计划在战时和战后都曾加以补充，成为共产党接管后制定计划的基础。1935年货币改革的成功刺激了国内和国外的投资。1937年，整个经济处在有力的增长之中。

我在《1937—1945年的中国与外援》^①一书中，曾这样概括了战争前夕的情况：

……1937年年中，持续、有力的经济增长前景良好。……关于发展的前景主要有两点保留。政府会不会像许多欠发达国家那样，对通货和经济过于急切，以致为筹措发展资金而走上一条方便的但却是危险的通货膨胀的道路？日本的侵略会不会使增长的过程功亏一篑？……

全面看来，国民政府在最初的十年里，在许多方面的活动中是取得了成就的；拿1937年情况同1927年作全面比较，就更值得大加称赞了。1937年，它的声望在国内和国外正在上升。这个国家当时正处在繁荣之中，国内安定总是给中国带来繁荣兴旺。经过混乱的十年之后，只要这个国家能保持安定，中国进入空前发展时代的前景是光明的。但是战事的过度频繁所造成的严重贫困衰弱却依然存在。

继日本1937年7月7日进攻华北之后，战争扩大到上海和全中国。这次进攻带来了一个战争、通货膨胀和内战的新时期，给共产党在大陆上的最后胜利铺平了道路。^②

^① 见《中国与外援》，第10—11页。

^② 关于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终于崩溃的战争方面的原因分析，见《中国与外援》，第421—426页。

第一篇 收入、支出和财政政策

第二章 现金收入和支出

支出增加而岁入^①缩减，是决定中国政府战时财政进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战事蔓延，对货币的需求成倍增长。由于作为大部分税收来源的主要港口和生产中心一开始就遭沦陷，政府岁入因而锐减。在战时条件下，在基本上仍由军阀势力控制的地区或人民基本上还过着中世纪生活的地区（在那里传统的“勒索”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要想迅速建立一个庞大的新的财政管理体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随着较发达地区的丢失，有行政管理经验的公务人员也随之星散。对许多人来说，离开沦陷区到内地去是不太行得通的。

岁出和岁入的差额，只能靠借债来弥补。有效地动员储蓄以供战争之用，这在日益缩小的“自由区”内是极难办到的。于是就免不了要直接地、大量地向各政府银行筹款。经过战争的头十五个月以后，大约有六分之五的信贷是采取增发钞票的形式进行。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基本上属于需求拉上型的通货膨胀。

为了使对各种事件和政策、各项可供抉择的方案以及影响各项决策的因素的论述有所依据，我将在本章提供有关战时政府的收入、支付和赤字等现金财务的主要事实。这几项数字包括不列入预算本身的政府各个机构的现金财务，但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与列入该预算者相同。第三章包括有关实物财务的资料。该章的结尾是对战时财政后果的概括，是把现金财务同实物财务合并起来论述的。关于岁入、岁出及赤字的财政政策，则在第四章中论述。

预算上的现金财务：收入和支出

1929至1945年各财政年度的预算岁入和岁出均见表1^②。此表所列的战前的数据资料，系根据国民政府自接管政权起到战争结束时止的财政部的帐目，它提供了一系列关于财政情况的可比性数字。据我所知，财政部战前有两个财政年度的数字未经公布。其他作者在论述中国战时财政和通货膨胀问题时，所有有关这两个年度的资料，都同财政部交给我的作为最后核定的数字大有出入。所以，我把这两个年度的资料细节及战时历年的资料细节，连同对有出入的数字所作的注释，一一列入附录A之中。

战时的通货膨胀和接连的事件，打乱了预算编制计划。追加预算日益增多，直到1945年时，总的核定金额竟达原预算的五倍。

① 本书所用“收入（receipts）”一词是指已收并已入帐的全部款项，而“岁入（revenue）”一词只是指政府的非借贷收入。

② 1938年年中以前，财政年度以6月30日为截止期。此后则按照日历年计算，但1938年下半年则作为一个独立的财政时期处理。